



车宁：数字普惠金融如何提 振乡村振兴发展质量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车宁

否极泰来，福祸相依。走出与病毒反复较量的防疫三年，政府和企业都需要重新置身于发展语境下锚定未来的工作方向。在政府，按照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是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企业，则是赓续此前如火如荼的数字化浪潮，推动由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由产业数字化到数字产业化的转型升级，以期能够更高质量地实现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



在政府政策引导和企业业务布局的交汇之中，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新趋势和国内近年增长主力军的“数实融合”（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最为各方青睐。特别是其中的乡村振兴场景，因为其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想象，以及本身自带的社会公益（ESG）光环属性，遂成为不同主体或拓展业务、或讲述故事的绝好素材。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即使摇身一变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时代宠儿，乡村地区所固有的产业基础薄弱、资源汇聚匮乏等瓶颈问题并未点石成金般快速消失，前数字化时代的技术应用、经营管理等历史欠账也依然如影随形。乡村振兴工作的高质量开展有赖于更多资源的注入。

在现代社会，金融既是资金融通的工具，也是资源整合的枢纽，在乡村地区导入金融资源，进而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对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及数字技术获取发展第二曲线意义重大。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就通过开办专业银行、信用合作组织等方式向乡村地区定向供给金融资源。而在不久前的脱贫攻坚阶段，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更是群策群力，体现了自己的使命担当。站在后疫情时代乡村振兴征程新起点，数字普惠金融有望以数实融合对接城乡融合，面对新情况，应对新挑战，谋划新举措。

一、乡村振兴新情况

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一场发生在乡村地区的现代化运动，其路径和逻辑自然也被现代化所定义，现代化同时也构成乡村振兴的最大背景因素。从历史看，现代化运动虽然起源于英国，昌盛于美国，但其模式却并未被英语国家所垄断，而是在扩散中被不同国家所形塑，相继出现了法德模式、

东亚模式以及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模式。

进入 20 世纪后半叶，由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启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因为其超大的市场规模和不依赖于殖民的原始积累，以及史诗般的赶超速度和建设成就，成为世所瞩目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二十大报告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要求得到浓墨重彩的阐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工作的有效开展，首先需要准确理解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之于乡村的影响。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本身也还是现代化，需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路径、历程和目标，具体到乡村振兴领域，最重要的就是产业更加现代，生态更加多元。

一方面，乡村振兴最基本的要求是产业更加现代，这首先表现在产品科技含量及产业组织方式的现代化，背后则是生产中知识水平及密度的革命性提升。从外部情况看，乡村振兴正在面临极为有利的时代机遇，作为中国目前重要发展趋势之一，制造业正在经历全领域、全产业链的转型升级。这种转型升级不仅包括以数字化、智能化为代表产业本身的“纵向”升级，也包括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从城市向乡村的“横向”转移，其间的资源整合、空间再造正是金融的发力空间。

另一方面，现代化的乡村振兴也意味着当地经济社会生态的更加多元。特别是现代化进入到“后现代”阶段，发展需要扬弃传统的单一产业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生态，起先是允许乡村居民被从乡土中解放出来，从事多

元化业务，以“新市民”的身份进入附近城镇及大城市，并保持与乡村的经济关联。当走出去成功实现后，引起来也就有了水到渠成的基础空间，不再“板结化”的乡村结构有利于引入外部资源打造更加丰富的商业生态。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可以资金为杠杆、数字技术为工具，充分挖掘、整合乡村内部资源，与外部对接、盘活。

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工作开展中还要特别注重其中的“中国化”特色，尤其是共同富裕、协调发展等本质性要求。

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征程上，共同富裕是写在旗帜上的关键目标，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来看，由于发展路径和资源积累所限，一定时期内难免出现了城乡二元发展及由此带来的贫富不均。但在二十大之后的发展新格局中，城市反哺乡村、发展成果共享不但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同时具有发展上的必须性。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文件精神，乡村振兴既可以培育新的消费和经济发展增长点，又可以对冲通货膨胀、外贸不振及城市消费萎靡的负外部性，构成经济发展托底的压舱石。除产业发展外，在融合空间方面，以人为本推进城乡一体化，形成都市群和城市带，也将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能。当然，宏大愿景的实现需要巨大资金的支撑，需要创新型的金融来适应、推

动。

与共同富裕相伴随，协调发展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色。不同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我国现代化的原始积累来自于乡村而非外部殖民地，不可能无限度竭泽而渔地开发榨取，这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也不相符。再加上发达国家环境问题、城市问题等前车之鉴，我国乡村的现代化就具有了多重内容，蕴含了多重价值。

除了经济发展外，乡村振兴还强调精神文化、生态文明等的齐头并进，一方面，乡村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满足可以开辟新的消费互联网业务增长点，进而带动相关的支付、消费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在粗放的城镇化发展进程告一段落后，除了土地等单一生产要素外，绿水青山等其他环境要素也可以吸引外部资源投资、消费，光能、风能、碳排放等绿色资源也可以作为资产进行交易。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乡村其他要素资源带来了可能的货币化空间，进而创造了绿色金融新的增长点。

二、服务三农新挑战

如前所述，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就有金融服务三农的专门机构和机制，其历史甚至可以上溯至土地革命时期。应当说，传统的三农金融模式基本适应了各个相关时期农业、农村、农民的基本金融需要，有力策应支持了国家建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是其服务对象亦或是金融机构自身，也都出现了影响业务持续性的新挑战：

其一是农村、农业、农企、农户本身的脆弱性，这些脆弱性虽然随着现代化进程在局部得以缓解，但并没有得以根本解决。以乡镇企业为例，其中的大多数仍旧不是经典市场经济意义上的适格信贷客户，不但缺乏与传统信贷相适应的抵质押物，其经营上也具有业务波动大、管理不现代等问题，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部分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意愿，乡村地区也相对缺少转型开展所必需的人力、技术等各方面资源。这就导致金融机构难以对乡村客户进行准确的风险定价和有针对性的产品创新。

其二是金融服务三农的扶助初衷与抽血现实相对立：一方面，为三农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本意是扶助乡村当地发展，但由于城市和乡村资源禀赋和发展速度的落差，以及乡村地区客观存在的信贷损失可能，导致服务的实际后果却是将廉价资金转移至城市；另一方面，早期三农金融服务普遍具有浓厚的帮扶政策色彩，并没有与时俱进地诞生现象级的产品、模式，因此也就缺乏商业上的可持续性，不但政策要求一经放松金融机构就缺乏维持的意愿，沉浸在政策导致的货币宽裕幻象中的企业一旦断奶也会出现经营困难，不具有真正的市场竞争力。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0457

